

评江口圭一教授《卢沟桥事件》一书

· 曲 家 源 ·

爱知大学的江口圭一教授是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史专家。他近年主要致力于研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十五年战争史（1931年至1945年），著述颇丰。1988年岩波书店筹划出版“昭和史丛书”时，特邀江口教授撰写了《卢沟桥事件》一书。这本《卢沟桥事件》篇幅不大，但资料丰富，论述扼要，它所表述的观点，在日本研究卢沟桥事变的论著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此书自1988年12月出版后，至1990年2月，已经印刷了4次，影响是广泛的。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国全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奋起抗日的开始，它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在中日两国之间看法却是截然相反的。江口教授说：“与柳条湖事件相比，卢沟桥事件的透明度不好，时至今日，有关的新见解、新事实仍层出不穷。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见解也存在重大分歧。因此，本书想就卢沟桥事件本身尽量详细地作一探讨和介绍。”^①江口的这本书以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为论述中心，往前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往后写到1937年7月28日日军占领平津。诚如作者所言，这本小册子对日本的卢沟桥事变研究具有概括和总结的性质。它批评了一些日本人的错误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较之过去确实前进了一步。这方面的情况可举以下几点来说明。

一，关于“第一枪”问题。卢沟桥事变，据日方说，最初是由在宛平城外演习的日军听到几响枪声致使“一士兵失踪”引起的。这几响枪声是谁放的？50多年来成了一个“谜”。

^①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岩波书店1988年12月版，第4页。

日本许多人下功夫研究，但答案五花八门，越来越出奇。日军前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在其《中国事变的回想》中曾大肆散布过“西北军”放枪说、“中共北方局”指使学生放枪说、“蓝衣社”放枪说等谣言。前两年在日本又流行一种葛西纯一说。有人冒称“葛西纯一”，捏造说得到一本中共军队的“战士政治读本”，里面承认是刘少奇领导北平学生放的枪。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不值一驳。江口在考察上述说法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军占领着阵地，阵地前日军进行夜间演习的地方，两军以外的第三者潜入，为了实现谋略的意图，在中、日两军之间的位置上，向日军或向日中两军进行实弹射击。这样的事大约是不可能的。^①

江口教授否定了所有日中现地两军以外第三者放枪的可能性，这对于澄清所谓“第一枪”问题，是有益的。

二，关于日军出动大队包围宛平城的“理由”问题。7月7日夜在卢沟桥畔演习的仅是日军一个中队，后来驻丰台大队出动才挑起战端。这个大队出动的理由在卢沟桥事变研究中至关重要。根据中日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和当时中外报纸的新闻报道，基本情况是：演习的日军中队忽闻枪声，发现“失踪”一兵，遂向丰台大队报告。大队出动，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但那个丢失士兵的中队长清水节郎在战后给史学家秦郁彦写的书信所附《手记》中却说：

关于失踪士兵，从今夜的演习来看，我想他不会走远。而且敌弹从头上相当高的上空飞过，所以首先不会被打死。如果被支那兵捉住的话，按照演习前我提醒的注意事项，理应采取点措施。因而我直感到这些不久就会清楚的，但为防万一，也立即进行搜索。等了一会儿，因为关于非法射击的报告更紧急，所以没有等待搜索有结果一并

^①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20页。

报告（这个士兵约20分钟后平安发现）。①

尽管清水节郎上述说法极不合理，与当时的实际过程也完全不符，但因为他是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中的当事人，所以这段话仍被日本许多史学家所注意。江口教授把事变当年日军《第一联队战斗详报》和大队长一木清直在第二年《朝日新闻》座谈会上的发言与《清水手记》相比较后，认为：

从以后所述的事情经过来看，感到《手记·书信》是伪造的。②

江口教授否定了因枪声而出动说。日军丰台大队紧急出动的原因既然不是为了枪声，那么就只能是为了向中方交涉搜查“失踪士兵”，这也就证明日军开始向中方提出进城交涉的理由是“失踪士兵”问题，从而解决了多年来一些日本当事人极力要否认曾提出过搜查“失踪士兵”这一悬案。

三，关于中日双方谁是事变责任者问题。曾经著过《日中战争史》的日本拓殖大学教授秦郁彦，在1987年12月的《中央公论》上写了一篇《现场营长公开了的宝贵证词》的文章。文中充满了对中国军队的歪曲捏造和强词夺理，本来毫无学术价值。但因为作者是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著名人物，所以该文一发表即被《读卖新闻》作了报道。文章在谈到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原因时，有这样几句妙语：

对于（日本）支那驻屯军来说，如果中国方面爽快地承认“非法射击”的责任在于基层士兵，并且由负责人出面谢罪和移防的话，是准备就此了结的。

因而，如果第二十九军的反应和行动再稍慎重和适当一些，就不至于发生卢沟桥事件，即使发生了也可作局部纷争而解决。

秦郁彦的这几句话活现出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现代标本。强盗闯进了主人的餐厅，主人不仅不能有驱赶的行动，而且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1年版，第166页。

②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21—22页。

还要向强盗“谢罪”，再把卧室让给他。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但秦郁彦的此文却很得日本一些人的赏识。江口教授对秦氏的这一谬论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作为卢沟桥事件实证研究的开拓者的秦氏，这是严重的片面的议论。牟田口和一木都明白日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但却以“非法射击”是对日军的“侮辱”、“冒渎”为由而出动大队……7月8日午前5时30分的战斗与宛平县城内的交涉毫无关系，是由牟田口、一木决定，日军单方面主动挑起的，这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明白事实。究竟日中哪一方的反应和行动应该“慎重和适当”呢？①

这些话，应该说是公正的，因为，所谓“非法射击”，既不能确证是由谁发射的，日军又没有受到伤害，中国军队为何要“谢罪和移防”呢？再退一步说，即使所谓枪声真的是由中国军队所放，他们守土有责，向闯入警戒区的日军鸣枪警告，也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有何罪可谢，又为何移防呢？江口教授对秦郁彦的批评，不仅表现了史学家的胆识和公正，而且也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正义和良心，令人敬佩。

江口教授在这本书中持论公正之处，当然不仅限于上举3点，但从这3点即可看出此书特色的一斑。江口教授的上述观点在日本并非仅见，不过他在这里表述得直接而集中，确能给人以精炼之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这本书在日本有相当代表性。

但是，江口教授这本书在日本还有另一方面的代表性，就是要证明卢沟桥事变是“偶发”事件。正如作者在此书开头所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见解也存在重大分歧”。其实，各种分歧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而策划的阴谋事件？江口承认日本有侵略意图，但否认有阴谋策划。他说：

①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36页。

从1937年7月7日到8日在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由于事前的计划和预谋而发生的。清水大尉指挥的第八中队并不是以挑起事件为目的而去进行夜间演习。由于第三者的预谋而挑起的余地也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与由于关东军参谋的计划预谋而引发的柳条湖事件不同，可以断定卢沟桥事件是偶发的事件。^①

江口教授的这本书从头到尾排斥了一切侵华日军阴谋策划的说法，就是为了证明卢沟桥事变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这正是中日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种种事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是侵华日军阴谋制造的“第二个柳条湖事件”^②，要把它解释成事前没有准备的“偶发”事件，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有许多碍难之处。为了证明卢沟桥变事的“偶发”性，一般日本史学家都使用一种称为“实证”的研究方法。所谓“实证研究”，就是孤立地研究一件具体的证据（证人、证词、“文件”、事例等），把有意说成“无心”，由此证明预先设定的结论——“偶发”。江口圭一在《卢沟桥事件》中运用的，也基本是这种“实证”方法。他的“实证”是从“第一枪”和“一士兵失踪”都是“偶发”而开始的。

他首先引日本NHK综合电视台1981年4月18日播放的《向历史的交代——卢沟桥枪声之谜》所说，据还生存着的当年在卢沟桥演习的日军士兵说，志村二等兵流露过这样的证言：“因迷路接近中国军的阵地而引起开枪。但因害怕被斥责而把事情隐瞒起来了。”又引中国的卢沟桥守军营长金振中1985年口述的回忆录《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中这样一句话，金指示其部下：“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然后得出结论说：

这样的《手记》和证词，加上金振中的回忆，那卢沟桥之谜的射击真相作如下设想是最妥当的了：按清水、河野两人《手记》，对日

①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37页。

②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论证，请参看我的《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一书，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将于近期出版。

军的空枪、号声的条件反射性的射击，或者是象第八中队士兵的证言所说，对接近中国军阵地的志村的威吓射击（和对号声的条件反射性的射击），是属于龙王庙一堤防一铁路桥的第三营第十一连的中国军发射的。①

既然是中国军队对日军演习“空弹”火光和集合号音的“误会”，或者是志村菊次郎“迷路”引起中国士兵开枪，这些情况当然是无意的“偶发”了。

但是，江口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他实际上给出了两个答案：（1）中国兵“对日军的空枪、号声的条件反射性的射击”；（2）中国兵对“迷路”的志村的威吓射击。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案，怎能说是“最妥当”的解释？前一答案不合情理，日军的“空枪”不是在演习结束时才开始放，他们从下午6时直演习到晚10时半，为什么中国士兵在这四个多小时中不对之射击？此说难以让人相信。后一答案，即所谓志村“迷路”说，也完全是后来文人们对战场情况的向壁虚造。他们没有想到，在当时的卢沟桥城外，志村是根本不可能迷路的。原因是：

（一）志村虽是新兵，但他自该年3月到丰台后，至7月7日已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训练，特别是6月开始又加强了夜战演习，已经训练有素（见《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不致迷路。（二）按清水《手记》所述，清水在距河堤100米左右，“背着河堤配置部队进行演习”。这一带是永定河冲积地带，地形平直。清水派志村去传令，他只能向前面大瓦窑方向走，而绝不会走到背后迴龙庙去“迷路”。（三）清水《手记》记载当夜无月，但能看见“远处星空下在卢沟桥城上游动的哨兵的身影”。卢沟桥距日军演习地有1000米之遥，尚且有这样的能见度，迴龙庙近在背后，当能看得更清楚。志村决不会盲目闯近迴龙庙。（四）按日军条令，传令需二人同行。清水派岩谷曹长向丰台大队传令即为

①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20页。

二人。志村怎能一人去传令，况且他是新兵？（五）退一步说，如是传令迷路，那么，当他看到前方射击，又听到集合号声，方位清楚了，他应该即刻归队，为何远处的假想敌都已归队，而他却要迟20分钟才回来？关于志村传令“迷路”还有一说：他是传令回来迷路，部队移动了，他找不到位置。此说也属编造。既是传令，他应同被传令小队一同回到集合点，而不应单独行动。况且集合地点就在中队长清水所在地，20分钟内并未移动。这就可见所谓“迷路”说是如何无稽了。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清水节郎在他的《手记》中也并不敢坚持这一说法，他强调的是“大便”说。而江口却从漏洞百出的志村证词和清水《手记》中得出“中国军”发射第一枪的结论，借以证明卢沟桥事变的“偶发”性，这是他研究中的一个失误。

江口教授既然认为“第一枪”和“一士兵失踪”是“偶发”的，那么，当大队长一木清直带领日军主力赶赴卢沟桥，听到“失踪士兵”平安归队以后，理应撤回军队才是，为什么他却仍要同中方“交涉”，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卢沟桥，否则即开枪开炮攻城呢？这岂不证明一木是在执行一项以占领卢城为目标的计划吗？江口教授回答：不，一木及其上司牟田口廉也在知道“士兵失踪”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仍要“膺惩”中国军队，这也是“偶然”的。这主要归罪于他们二人“气量”不大，过份注重“面子”。江口教授的结论是这样说的：

总而言之，牟田口、一木是为了维护日军的“面子”、“威武”、“威信”而攻击中国军的……在他们的头脑中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到攻击的结果会给日中间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仅仅是为日军的，更确切地说是为牟田口、一木的面子，或更直率地说是为他们的气量而挑起了攻击。①

以“面子”来解释挑起如卢沟桥事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

①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38页。

原因，对于一向以绝对服从著称的日本军队来说，不是显得理由小了一点吗？而且，“面子”问题是在何时提出来的？江口也承认，牟田口和一木决定为搜寻“失踪士兵”而出动大队时并未想到面子，只是在由于“失踪士兵”归队而不成其为进攻中国军队的理由时，才提出枪声伤“面子”的问题。这不正充分说明所谓“面子”说纯系编造吗？“面子”云者，只有真正伤害了面子才能激起人的恶劣情绪。不论头脑如何简单、脾气何等暴躁的人，只要不是真正伤害了他的感情，他也决不会轻易杀人的。而在1937年7月7日至8日的卢沟桥畔，找不到任何有伤日军面子的事情。即使是那些日本侵略军人，也说他们的面子是完好无损的。据日军《北平特务机关业务日志》记载，7月8日凌晨2时20分，旅团小野口副官电话：“已了解清楚，失踪的士兵平安无事，因而对我军没有丝毫损失。”

这些日本军人心里都清楚：所谓“枪声”和“士兵失踪”，都是他们事先精心策划的“谋略”。他们的目的是夺取卢沟桥，手段是借口搜查“失踪士兵”乘机抢占宛平城。“失踪士兵”归队以后，又临时抓一个枪声伤“面子”的由头。他们是在演一出自编自演的拙劣的戏，叫嚷“面子”、“威武”云云，都是给外人看的。江口教授虽然注意到日军挑衅借口由“士兵失踪”到“非法射击”的转变，但却忽略了日军强词夺理所包藏的险恶用心，而花了很多笔墨去考证牟田口和一木的“面子”，一本正经地研究那几句“狂妄而浅薄”（江口的评语）的话，这就显得舍本求末了。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东京政界就盛传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①从那时开始，50多年来，“第二次柳条湖事件”就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日本史学家的卢沟桥事变研究。只是他们所努力做的，是要从相反的方面，证明卢沟桥事变不是第二次柳条湖事件。江口在《卢沟桥事件》中对此也有专门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论述，他说：

卢沟桥事件与柳条湖事件的情况大不相同。柳条湖事件时，对于军队按预谋挑起战争，政府（第二次若槻内阁）采取不扩大方针，军中央大体遵循了这一方针。但在卢沟桥事件中，现地军队无论如何要把偶发的局部战争导致停战，然而政府和中央军部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措施。^①

按江口教授的说法，在柳条湖事件和卢沟桥事变中，日本政府和军部与侵华现地日军对扩大与“不扩大”政策，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即：

柳条湖事件	└ 现地日军：扩大。
	└ 日政府和军部：“不扩大”。
卢沟桥事变	└ 现地日军：“不扩大”。
	└ 日政府和军部：扩大。

既然华北现地日军在事件发生后是主张“不扩大”的，所以卢沟桥事变是“偶发”事件。江口的上述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整个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尤其在侵略中国的一些关键时刻，江口教授真的相信在日本政府、军部和侵华军队中有一个“不扩大”派在控制着局势，这至少是太天真了。事实是，在柳条湖事件中，日本政府和军部并不是主张“不扩大”的。最初的九一八事变计划就是由组成军部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共同制定的。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大本营陆军部》记载：“满洲事变虽为省、部共同策划，但原动力实为参谋本部的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②诚然，以币原外相为主的一些阁僚不同意关东军用“谋略”公开占领中国东北，但他们并非不想占领东北，而是顾虑列强对日本独得这样大的殖民地利益进行干预。所以当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用阴谋手段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关东军在南满线全线出击，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日本军

①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47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部的几个主要首脑无不欢欣鼓舞，表示支持。这正如事变第二天，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给关东军的电报中所说：“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①扩大战火，关东军兵力不足，日驻朝鲜军决定增援。9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进行讨论，首相若槻、陆军相南次郎均表同意。但调动日军属天皇大权，这又发生“擅权”问题。9月22日阁议决议如下：

一，对朝鲜军之独断越境问题，全体阁僚并未声明反对，但亦无人积极表示赞成。今朝鲜军出动已成事实，则结论即已予承认。

二，既已承认事实，经费亦决定开支。^②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关东军才无所顾忌的在三个半月时间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年3月1日，日本又一手策划扶植起一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怎么能说日本政府是主张“不扩大”呢？

实际上，所谓“不扩大”，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块招牌。从九一八事变起，它采用“谋略”手段，对中国实行逐步推进策略。它侵略中国的每一步实际行动都是在“不扩大”的叫嚷声中进行的。在卢沟桥事变中，从日本政府、军队到驻华北现地日军，都是在一片“不扩大”的叫嚷声中增兵增炮极力扩大事态，步调、态度是一致的，哪里有什么“不扩大”派？

江口教授的这本小册子是由评论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否认日本侵华的发言开始的。奥野说：卢沟桥事变时，“日本政府一直坚持不扩大方针，我想对此毫无说明的必要。”江口教授批评说：奥野“把政府的态度完全误解”了，当时日本政府是支持扩大的。他们两位的分歧即在于：一位抓住日本政府的“不扩大”宣言，而另一位则抓住日本政府的扩大行动。当然，按照行动来判断一个政府更符合它的本来面目。但是，江口教授在分析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194页。

② 同上，第197页。

华北现地日军时，却犯了与奥野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其言论而不看其行动。其实，现地日军更是唯恐侵略中国不扩大的。请看以下事实：

7月7日10时半，所谓“枪声”和“一士兵失踪”事件发生后，清水立即派人向上级报告。接近零点时，情况报告到丰台。一木大队长的反应是：“我认为仅因遭到射击，是不会马上派人来的。但一士兵失踪的话，则是件大事，所以就下决心紧急集合。”^①7月8日两点零三分，一木率日军大队与清水中队会合于宛平城东约3公里的五里店附近，已得知“失踪”日兵平安归队，但仍命令占领宛平城外唯一制高点沙岗，布为炮兵阵地。^②这是“不扩大”吗？

在一木与清水会合前半小时，即除清水节郎一人以外，其他日军负责人均不知道“失踪”士兵已归队的时候，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卢沟桥附近发生的事件。虽然会议宣称“这不是大事件”，“毫无紧张气氛”，但仍然命令天津日军包括病员、病马在内的各部队在一个半小时内做好出动准备，并于7时30分命令出发。这是“不扩大”吗？

7月8日上午9时，华北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谋求事件的解决。

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③

说“谋求事件的解决”，好象是“不扩大”，但要占领中国的城镇、土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这是“不扩大”吗？

当时参加同中方谈判的日军代表今井武夫是把“不扩大”喊得最响的一个。他向中方提出的谈判条件是：

一，要求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并保证

①② 《朝日新闻》座谈会发言。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4页。

今后不再挑起类似事件。

二，中国军队不得驻屯在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

三，鉴于本事件系在蓝衣社、共产党及其它抗日团体的领导鼓动下挑起的，故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应向日军提出承认以上条件的书面文件。

承诺以上条件后，日华两军立即撤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驻军应按我方要求执行。^①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方面要“道歉”、“处分肇事者”和撤军？过失不是日军自己造成的吗？如果反过来，是由中方向日军提出这类条件，也还符合情理。而事实是日军向中方提出，想以此得到“谋略”没有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欺人太甚？是不是蓄意扩大事态？日本许多史学家在论到这一历史过程时，均回避日军条件的实质，而只强调他们“避免事态扩大”这句口头禅，他们这是有意无意受到“不扩大”烟幕的蒙蔽。

其实，江口教授内心对以上华北日军扩大事态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是专门论述了现地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大队长一木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坚持攻击中国军队扩大事态吗？我们曾经指出，把挑起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样极为严重的大事的原因，归罪于少数几个人的“面子”，情理不通；但江口教授指出的华北日军的一些军官特别狂妄、好战和富于侵略性，是他们扩大了卢沟桥事件使之成为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这还是符合事件的部分真相的。江口在该书结论处论到卢沟桥事变另一部分原因时说：

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多年来防共和确保资源与市场，而把华北纳入到日本统治下的欲望，把这个偶然发生的麻烦当作绝好的机会利用了。^②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3页。

② 江口圭一，前引书，第57页。

江口教授只说对了前半句话，后半句却错了。“绝好的机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日军用“谋略”制造的。把日本政府的侵略性和现地日军的侵略性综合在一起，卢沟桥事变的原因差不多已经被江口正确地总结出来了。

统观全书，江口教授在否认日军有“谋略”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他把日军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分离了。我认为，手段是由目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目的，就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手段。“卑鄙的手段成就不了高尚的事业”，反过来也一样，损人的目的只能用卑鄙的手段去实现。说日本有侵略中国的强烈愿望，但却没有使用卑鄙的“谋略”手段，是无法令人置信的。这也正是江口圭一在这本书的论证上出现矛盾的原因所在。

（本文所引《卢沟桥事件》中的文字，承蒙薛成水先生帮助翻译和校正，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本刊上期勘误

	误	正
第110页15行	农 <u>恩</u> 军	农 <u>垦</u> 军
第184页2行	1月7 <u>日</u> 起	1月起
第187页8行	成 <u>员</u>	成 <u>分</u>